

呵护和帮助

1972年，我所在的公社发大水，农田被一片浑黄的湖面覆盖，仅有一撮撮山芋（红薯）秧犹如浮萍飘荡在水面上。我和社员们以剪山芋（红薯）秧充饥。一个多月后，我和很多老乡全身浮肿。就在这极度难熬的关键时期，父母寄来的10元钱，我如获至宝。因水灾，附近的邮政所无法取到款，我只得按照县邮局指定的取款点，骑自行车来回100里地取得了那非同寻常的10元钱。

正是父母这种看似遥远却又近在眼前的呵护和帮助，鞭策和激励我在那偏僻的第二故乡——淮北农村异常艰辛的困难环境里，克服了“打摆子”（疟疾）、饥饿、失眠等困苦，奋斗了近五年。我在那里当了两年生产队队长，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里将上工农兵大学的名额让给了年长的知青队友……大概我在农村的表现尚可，带新兵的参谋长和连长硬将我这个大龄知青应征入伍，我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地震，我随部队当天夜里赶到灾区救灾。由于当时部队纪律规定，我们在灾区无法与家人书信或通讯联系。不巧，这一年10月7日我祖父游喜堂95岁高龄辞世。亲朋好友都通知到了，唯独我这个家里的长孙远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全然不知。再加上两个多月我与家人音讯全无，母亲不知哪来的勇气和功力，凭着我以前来信告知部队首长是上海人，家住南翔的细微线索，竟然第二天早上6点出发从交通路大洋桥住处徒步五个多小时，中午到达嘉定县南翔镇，多方打听求助终于找到部队团长在上海的家，向团长

夫人说明来意。对方见母亲如此艰辛找上门来，深为感动，当天就通过她与丈夫联系的渠道，打了电话并发了电报。团长接讯后，通知我到唐山救灾指挥部帐篷办公室里，告诉我祖父去世的噩耗，先是安慰，随即赞不绝口：“你有位平凡而了不起的母亲，令人崇敬、敬佩！救灾结束，我放你10天假！”

1978年12月，我在铁道部上海物资办事处人事科工作，按照国务院104号文件规定，凡职工知青子女符合相关条件均可顶替父母到上海工作。当时我单位有顶替职工子女一百八十多人，大多数在云南、贵州和黑龙江等地，上级命令我们派人去速办。单位领导先让一位同事到东北去办此事，那位同事自称有关节炎想到云南去接知青，要享受南国的暖意，对关节炎有好处。领导转而认为我在部队救过灾能吃苦，决定派我到黑龙江二龙山等边远严寒地区去办知青顶替调动的具体事宜。我觉得年关已近，那边太冷，同事怕冷，可我也很寒啊，便想与领导提出过了年暖和些再去。可谁知，母亲知道后严厉地呵斥了我：“你从部队回来，当了个芝麻绿豆官，就忘本了，不服从领导，不想为人民服务啦？几年前，你在地，我们做父母的什么心情？估计你不清楚！现在这些知青不回来，他们的父母肯定每天都睡不安觉，吃饭不香！不要忘本，将心比心，赶快去！”

我遵照母亲的嘱咐：坐了三天两夜的硬座火车，在北大荒赶了两通宵的夜路，将十多名与我命运

的知青朋友接回了上海。

上了一堂难忘的课

1988年，我任铁道部上海物资办事处真如材料厂厂长兼书记期间，父母特地把我叫到家里上了一堂难以忘怀的课。父亲说：“当厂长要跟工人一样，早出晚归，最好提前半小时到厂里，争取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脏活、累活、险活你先做，少说多做人家就服帖你了。”母亲说：“当厂长有权不能瞎来，必须一不贪二不色三不欺负人，真心实意为工人服务，不能让人家当面说你好话背后戳你脊梁。最关键的就是要带好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父母再三叮嘱：这几点你必须做到！我说尽力而为！他们似乎不满意，嘟囔着：实在不行，你这个厂长就不能当！我忙表态：全力以赴！

1989年8月份，天公不作美，连日暴雨台风频袭上海。那月的一天晚上10点余，狂风暴雨显得格外猛烈，我接到命令必须当夜12点前将20节车皮钢材装载完毕发往东北齐齐哈尔等地。狂风暴雨好像有意作对似的，吹打得龙门吊车不停地摇晃，行车司机不敢登上十多米高的操作室。情急之下，我顶着狂风暴雨首先爬上摆动的行车操作室。行车司机跟着爬了上来。我站在十多米高的操作室门外，抓紧走道护栏任凭风吹雨打，果敢指挥行车司机紧急操作。行车司机工作二十多年了，从未见过哪位厂长竟然如此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鼓足干劲沉稳操作，在限定的时间前

顺利操作完毕，子夜12点前将这批物资发往了急需地。

日积月累的平凡工作，不仅得到了职工们的认可，也得到了上级的褒奖。1990年，我们厂获得了铁道部优秀企业称号。这一年，我离开了相伴数年的工人师傅和熟悉的材料厂，调入上海市级机关工作。

1991年春，大批农民工已进入上海各行各业。尤其是上海的建筑行业，农民工日晒雨淋工作极为辛苦，但工资待遇偏低。为了解决这突出的矛盾，我和孙钟炬等同仁，多次拜访市建工局（建工集团）、市住宅建设总公司（住总集团）等单位的领导，并三天两头到黄浦江大桥建设现场，地铁1、2号线地下工地，了解一线工人（主要是农民工）工作状况和实际情况。根据这些多日调研了解的第一手资料，通过专报和与领导一同过组织生活或单独接触的机会，向市领导呈报了农民工进城工作同工同酬和劳动保护等问题。市领导高度重视，指令有关部门按规定调整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逐步适度改善了农民工的劳动待遇和工作环境，有关单位的税费有所减免，激发了相关行业劳动者的积极性。他们为上海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对农民工和外来劳动者较有感情。因为看到他们的辛劳，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唱响心底那永恒的火红的青春之歌：过长江，荷锄淮北种田忙；上燕山，扛枪救灾保国防；回家乡，肩负重任为理想……我尤

其敬重那些凭自己双手创造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因为从他们的艰苦奋斗中，我仿佛看到了六十多年前父辈们年轻时拼搏的身影。虽然时代不同了，环境改变了，但是父辈们血液里永远流淌的纯朴的劳动本色，每时每刻都在激励着我们。

2004年春节期间，上海寒冬凛冽，很多自来水管爆裂。正月十五的早晨，我到父母住处拜望二老。结果在小区前的道路上，看到80岁高龄的父亲竟然骑着“黄鱼车”（人力三轮车）前行，母亲坐在车架上，去回收站卖那满车的旧货。我急忙追上二老，请他们赶快回家。父亲却一本正经地说：“你小弟现在待业在家，生活有点苦。我们做父母的趁现在还做得动，赚点小钱补贴补贴，也是我们老有所乐嘛。”母亲还补了一句：“我们活到老做到老，重温当年挖野菜的生活。现在条件比老早好多了，这样也算是出来兜兜风。”我热泪盈眶，想不到父母晚年竟然执拗这样的老有所乐和兜风！特别是父母那永不退休的劳动本色，恐怕我们现在的后来者是难以效仿的。

2011年11月1日，母亲以84个春秋的出彩年华慈祥地远去了。2016年3月18日，父亲以93个春华秋实的年龄，到那脱离尘隔世的天国，去追随母亲的情影了。但是二老留给我们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而由这些宝贵财富堆积起来的高山和开拓成的长河，要用文字表达完全可以编成洋洋洒洒百万字的巨著，但那也仅是山隅一角长水一段。因此，最为确切的表述方法就是用最简单的七个汉字：山高水长铸本色。

（摘自《档案春秋》2017年第3期）

上海方城

余之



33.哪一个不想上海

梅香说：“儿子，妈咪不稀罕它值多少钱，要是它真值钱，妈咪如今也老了，也不想保留它，妈只在乎用它帮我办一个福利院，如果钱不够，曼丽阿姨都说他们会追加投资的。前不久，龙彪叔说他有一个香港朋友在那里的拍卖行拍得一副翡翠手镯，净值几十万，他说这副翡翠麻将牌至少能抵得上几十副手镯呢，要是真的话，那妈咪的愿望也有望实现了。现在妈咪托付你来处理这副牌，你拿到香港拍卖行去试试吧。”

宝宝说：“好的，妈咪，无论这副牌能不能拍卖成功，我都会尽全力帮你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这是妈咪做的积德的善事，宝宝一定帮你做好。”

梅香又问道：“这些年来，你爸爸的身体还好吧？”宝宝说：“爸爸的身体不是很好，这次他陪妈咪去美国看病，顺便也让他作一次全面的检查，人老了，就是思乡，想念上海。我看他这些年来总是提不起精神，很少与外界来往，只是在上海去香港的老人圈里走走，有一个在爸爸之前去香港的徐伯伯常与他来往……”

“徐伯伯？就是那个人长得胖胖的，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的？”梅香打断宝宝的话问道。“是的，是的，是戴眼镜的。”“他叫徐伯韬，过去在银行里做的。”“对，对，叫啥名字我说不上来，但他老讲一些旧上海银行里的事。”“他可是个上海通，妈咪刚到上海来的时候，上海的事一点也不知道，他老是跟妈咪讲些上海滩的旧事，蛮有意思的。他们两人碰在一起就是喝喝绍兴老酒，我看他们总是唉声叹气的，有时酒喝多了，就唱几段旧上海的老歌，什么《夜上海》《夜来香》《苏州河畔》，说的都是一些老明星，啥个周璇呀，黎莉莉呀，白光呀……我在他们身边长大，有些歌我跟着唱也会唱了。”“会唱了？你唱几句给妈咪听听。”“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恻……”宝宝唱了起来。“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

来香，吐露着芬芳……”梅香也跟着唱了起来。“妈咪也会唱？”宝宝惊讶地说。“旧上海过来的人都会唱，那个时候弄堂里的收音机、留声机里全是这些歌声。”梅香深情地望着窗外，她的思绪似乎飞到三十多年前的上海。“爹地（爸爸）与徐伯伯有时酒喝多了，唱着唱着就像小孩一样哭了起来，怪了。”宝宝说。

“思乡了，一定是思乡病发了，那些年离开上海的人，哪一个不想上海啊，前些天妈咪的几个老朋友史太太、胡太太都来信说想上海，有机会的话，他们一定要来上海，他们说叶落归根，就是死也要死在上海。”梅香说。“喔，对了，我听唐教授说他们学校里最近有几个与美国学校交流学生的名额，听说妹妹柳梅也在其中。”宝宝说。“你妹妹自从认了你这个哥哥后，一时情绪受了打击，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去了美国念书的念头的吧。唉——”梅香叹了一口气。

“说我什么呢？”像是一阵风吹来，母子俩说话间，进来了柳梅与龙小丽。“说你闹情绪，想逃避到美国去读书了。”梅香说。“我才没闹情绪呢？”柳梅说。“是啊，我看不该闹情绪，少了一个男朋友，多了一个亲哥哥，划算。”梅香说。“柳梅姐这几天情绪好多了，唐教授让她去美国深造了。”小丽说。“你去了美国，那我们公司你的那一份工作怎么办，唐教授难道没有考虑？广州那个项目眼看要完成了，你却丢下一摊子事走人了？”宝宝说。

“你不用着急，唐教授早就考虑好了，他把我们学校的一位高材生分派给你了，”说完她又特意加了一句，“还是一个大美女，我们学校的校花。”“谁？”宝宝说。柳梅将龙小丽往宝宝面前一推说：“就是她呀！”“怎么？看不上我呀？”小丽还是那个性格，快人快语，像她妈曼丽。“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唐教授手下无弱兵。”宝宝说。“那你算是收下我喽？”小丽朝宝宝挤挤眼。“小丽是个好姑娘，妈咪看着她长大的，在我们香粉弄里她与柳梅一样都是品学皆优的三好学生。”梅香说。“妈咪，我早就听唐教授说过小丽了，我满意。”宝宝说。“小丽，你听见了吧，我满意！”柳梅神秘地朝小丽挤挤眼，这下子，小丽倒是不好意思起来，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10.捡到了20斤粮票

大约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某一天课间休息时，二联小学的广播喇叭里开始不断播送一篇表扬稿，历时足足有一个礼拜，说的是某某同学兄弟俩在上学路上捡到了20斤粮票，拾金不昧交给了老师。这某某同学兄弟俩正是我们班上的，是双胞胎哥俩，姓名已然有些模糊了，依稀是姓邵或姓赵，绰号却记得分明：“大块”“小块”。于是，他们一下子成了班级典范、学校明星，连走在学校操场上教室走廊中，都免不了把头脑抬得高高的，把胸膛挺得直直的，让人们看到他们胸前的红领巾在神气活现地飘扬。是的，他们有足够的理由骄傲和自豪。

今天的年轻人完全不能明白当年这20斤粮票的价值了。那时候，居民们的粮食是定量凭票供应的，每家每户要拿着发给的购粮证去附近指定的米店用粮票买米，并且每个月的大米和洋糯米都是按一定比例规定供应的。粮票的发放基

本上是按家庭成员的不同结构发放，例如学生、社会青年、家庭妇女等工作人员之类每月18斤，干部27斤，工人则按不同工种自27斤至34斤不等。特别说明，一切点心类食品，包括饼干，都是要收粮票的。哪怕大饼油条，也照收不误。上饭店吃饭，粮票！到路边摊头来一碗阳春面，粮票！如果没有粮票，寸步难行，什么都免谈！有一个时间段，个别糕点曾经放开过，免收粮票，但是加收钞票，明明高价黑市价，偏偏美其名曰：高级糕点。可以说，凡是牵涉到“民以食为天”的一个“食”字，万般皆下品，唯以粮票为大！

说一个个案，邻里有户人家，每个月省吃俭用，想从嘴边抠下一点粮票好“活络活络”，比如去换几个黑市鸡蛋、换两尺布票什么的（那时候大到柴米油盐酱醋茶，小到肥皂草纸火柴什么都得凭票供应），不料丈夫出差，忘了把当月的20斤上海粮票从兜中取出，待到回沪发觉，已然过期作废，这一来真是急得双脚跳！其实，哪怕四脚跳八脚跳也统统没有用，只能面对家中供不应求的大

工人新村



管新生

人小孩吃饭嘴巴的现实。除了把购粮证上供应的大米定量让给别人，交换对方的粮票，比如一斤大米可交换得一斤半糙米。另一方面只能进行“地下非法票证交易”，将香烟票豆油票肉票蛋票糖票布票等去交换粮票，甚至动用钞票去黑市购买粮票。最后一招便是大人把肚皮勒勒紧，能少吃尽量少吃，不能吃尽量不吃，绝不能让正在上学的孩子受饥挨饿。饶是如此多管齐下，直至半年以后方才喘过气缓过劲来。

20斤粮票，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面值。记得粮票除了以“斤”为计量单位，以下尚有“两”：伍两、贰两、壹两，直至半两。据悉全国各地发行的地方粮票中，最小单位均无此例，所以“半两”的上海粮票是最具上海特色的，它可以买一根油条，或者一碗小馄饨，或者一碗白粥，再或者一块蛋糕……抑或，也听到过不少外地朋友的诘问，这是不是体现了上海人“精乖”的一面？以“半两”粮票论，是不是太有点小家败气？就油条而言，大多地方均一两粮票一根，武汉最威猛，二两粮票一根！初始，也不解。后来去到北方南方诸地，一见当地的油条（有叫油炸果子的），几乎吓一跳：哇塞！好大的个儿，抵得上上海油条的倍数！怪不得收的粮票也往上直窜了。当然，也有的地方是论斤称的，而不是以“根”出售的。

据资料云，自1959年开始，上海的市场副食品供应全面紧张，对大白菜、萝卜、葱、蒜、副食调味品、糕点、糖块也采取按人口分配，限量供应或凭票证供应的办法。此后，限量供应或凭票供应的种类逐年增加。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上海市区商业部门发放的各种商品供应票证多时达53种，141个票面。按人或按户分配的票证，由粮店代发。粮票是上世纪90年代初取消的，油票、肉票等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取消的。

对我们来说，小学生涯可谓人生的第一课。其中最为难忘的，是每天老清早天还没亮时，去小菜场里排队买菜的故事。那时候因为物资匮乏供应紧张，不少人家常常是很提前量地小菜场里通宵排队。